

外面的世界

朱正琳 著



上海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外面的 世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面的世界 / 朱正琳 著.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18.5

(“私历史” 丛书)

ISBN 978-7-5207-0259-1

I. ①外… II. ①朱…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44629号

外面的世界

(WAIMIAN DE SHIJIE)

作 者: 朱正琳

责任编辑: 安玉霞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 编: 100007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4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207-0259-1

定 价: 49.00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602 85924603

自序

从书名不难看出命题作文的意思：有一本《里面的故事》在先，才引申出这样一个题目，有硬凑“姊妹篇”之嫌。编辑陈卓先生让我写写从“里面”出来后四十余年的“私历史”，但我写下来的只是一些片段，没有完整连贯的叙事，难当“历史”之名。而且，我的着眼点主要不在自己的“人生际遇”，而更多的是在说我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自然也包含了我对那些见闻的理解。因此可以说，我的叙事视角确实是偏向“外面”的。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涉及所谓“心路历程”。不过，回头再看过去，发觉我反复写到的内心感受竟是一种不能进入角色或不能真正在场的疏离感。借用我近日读到的法国小说家奥利维埃·罗兰的话来表达：“我的感觉是自己‘在错了地方’。”或者也可以说得通俗一点：我总感觉自己是在“在外面”。

如此看来，我至少还算没有跑题。

目录

出狱

没有被杀头的阿 Q 又从头再来 / 003

事情正在起变化 / 011

入学

录取风波：斗胆上北京给了一个说法 / 017

附：考分第一，榜上无名，道理不公 / 029

北大生涯：拧巴着来到一片开阔地 / 035

“老家伙”的纪念：与“三剑客”相遇在北大 / 047

附：大路上走来了我年轻的弟兄 / 055

北戴河纪事：海的那边还是海 / 059

出国

西德见闻 / 081

两德统一进程见闻 / 091

东欧之旅 / 095

快乐的 Schobin 老太 / 099

办刊

《三联生活周刊》：“史前史”的一个小片断 / 115

《东方》：我现在可以说的一些事情 / 119

关于《成长》，关于成长 / 133

关于《精神》，关于精神 / 139

附：满江几时红 / 142

北漂

十年打工：栖身在央视 / 149

附1：倡导读书，媒体可以做些什么？ / 159

附2：镜头 / 161

附3：煽情与搞笑 / 164

十年抬杠：只有一个大众？ / 167

附：传媒、大众与“新” / 171

雁过留声：《读书时间》的几位嘉宾 / 175

特别的子尤 / 190

附：心疼子尤 / 199

还乡

客居故乡 / 207

渴望交谈：老了的老岳母 / 211

附1：叟媪住院记 / 255

附2：死的理想 / 259

游走

引言 / 265

游俄笔记 / 267

游美笔记 / 290

附录：小事记（1975—2017） / 319



出獄



1975 年出狱后不久

没有被杀头的阿 Q 又从头再来

1975年9月18日，我出来了。我是说，历时四年两个月零九天的“里面的故事”在那一天正式结束，我回到了外面的世界。自己觉得有几分像流产版的阿 Q，真人秀一般（被）历经了“（反）革命”“不准（反）革命”的风云变幻之后，到了“大团圆”一章却没有被杀头，变成了小团圆。于是，也没能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也没能唱“我手持钢鞭将你打”，便又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原点。一个没被杀头的阿 Q，虽不敢唱“人生豪迈”，却也只能“从头再来”：“优胜纪略”且从略，因为已没什么机会与人争，“优胜”自然无从谈起，“恋爱的悲剧”也可从略，因为我出狱后很快就与隔墙守候数年的恋人结了婚，悲剧没有诞生；我真正须面对的，乃是“生计问题”。

那年头，找到一个“正式工作”就等于找到一个“铁饭碗”，一辈子的“生计问题”也就基本有了保障，有“组织上”管了。但是，且不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就是经济景气，也还有一道叫作“政审”的门槛要把一些人挡在门外。也就是说，“组织上”有意识地不让一些人“正

式工作”。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了一支革命队伍，任何一个行业都成了“战线”，任何一个可供就业谋生的地方（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等）都成了（战斗）“单位”，任何一个职位也都成了（战斗）“岗位”。因此，政审是必不可少的，战斗要求队伍的纯洁度。当然，“战线”、“单位”和“岗位”依其政治上的重要性而有等级之分，政审的门槛因而也有高低之分。但那道最低的门槛却也是世上最高的门槛，因为就是它从根本上把你排除在那个等级系列之外，所以也就省去了“优胜纪略”。你不在任何一个“单位”，你就在“社会上”。“社会上”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贬义词，因为那个去处总是会“滋生”（当年常用语）一些非组织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按当时的看法，几乎所有非组织的活动都迹近犯罪。做小生意叫“投机倒把”，包工队接活干叫“飞机工”……可是，被组织排斥在外的人（没有“单位”的人）总得解决“生计问题”，所以非组织的经济活动就总是屡禁不止，在经济不景气的年头尤其活跃。

“社会上”乃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若干从劳改营刑满出来的“劳改释放犯”和（如我一般）从看守所获释的“关押释放犯”就在那里找口饭吃。释放了还是一个“犯”，那是当年的通行用语，也反映了当时的思维定式。那一个“犯”字跟定了你，成为一种终身待遇，别人想不歧视你都难。更何况跟定你的还有你的档案，那比古代罪犯（想想林冲！）脸上刺的金印还要厉害，因为你自己永远看不到那档案里究竟写了些什么。我获释那年已有二十八岁，不想自讨没趣，出狱后就没有存“找个正式工作”之想，因此也就没去街道办事处登记申请“组织上”给“分配工作”。顺便一说，当年的“找工作”，实际上就是“找关系”，没有“关系”可找者，按正常程序就只能等待“分配”。这是组织原则。

我知道自己靠不着“组织上”，只能自谋生路。“社会上”的门道说

来也不少，但干力气活的临时工总是“食物链”的底端，比较容易谋得。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在那个年代，建筑工地向来是吸纳被排斥在“社会上”的“闲散劳动力”的最大场所。主要还不是建房，那年头建房的事很少，而是修路或建其他公共设施，比如机场。早在1964—1965年，贵阳磊庄机场扩建，吸纳的民工就恐怕上万人。我有一些因家庭成分问题失学待业的朋友就在那个工地干过。有一晚我乘兴骑自行车去看望他们，只见几十顶大工棚像兵营一样排开，每顶工棚中两排大通铺至少可睡好几百人，也称得上蔚为壮观。第二天早上跟着朋友到工地观光，那种“蚂蚁搬泰山”（当时常用语）的景象也让我终生难忘。那时候的筑机械还很少，全靠人用铁镐挖、用箩筐抬，所以我们这里的民间习惯称这种工地上的活儿叫“挖土方”或“抬土方”。我在入狱前也曾在此类工地打过零工，但规模通常要小得太多。

我出狱后自谋的第一桩活儿也是到一个建筑工地做副工，给技工打下手，搅拌水泥灰沙什么的。那也是一个很小的工地，主要工程是修堡坎，就是用石头砌成一道堤以防山体滑坡的意思。第一天老实实在地干副工，与我搭档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大概因为引荐我的朋友特意交代说我刚出狱不久，不适合干太重的活儿。第二天上班，却出现一个意外：有一个抬石头的组合突然缺了一个人。那一组人是由四人搭档（工地上叫四抬），抬的石头当然都比较大，在工地上也算比较有地位的主要劳力。四人中有一人因故未到，那情景便有几份像麻将桌上的“三缺一”。也许是发现工地上还剩下我这么一个男的，于是火急火燎地过来找我商量，希望我顶一下班。我过去也不是没干过这一类活，估摸着自已还吃得消。再说了，跟一个小女孩一起受人照顾，本来也觉着自己脸上不太好看。总之，我一时逞能，竟欣然接受了。一天抬下来，没有太

露怯。本以为这一班算是顶过去了，第二天照旧回去做我的副工。没想到第二天“三缺一”的局面照常，原因不详。我于是又顶上去。工地离我住地很近，中午休息时我照例回家吃饭。吃完饭坐在一小板凳上休息了片刻，准备起身再去工地时却站不起来了。严格说我其实还是站起来了的，但扑通一下我又坐回去了。我于是再站，依然是扑通一下就又坐了回去……歇了好一阵后我才算是真正站了起来，但决定放弃回工地了。我明白我的体能还且得恢复。我出狱后的第一次打工就这样结束，前后一共只有两天半时间。那个工地的工头人不错，后来还给我算清了两天半的工钱，托我的朋友带来给了我。尽管事出有因，但我终究是临阵脱逃，本没指望过要工钱的。

大约是帮忙的朋友们得知了我从某工地铩羽而归的故事了吧，我接到的第二桩活儿一下走到另一个极端，完全不需要体力——给一个大学刻蜡纸。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和电脑，好多资料性的东西都是采用油印。一块小钢板，一支铁笔，一张蜡纸，刻写蜡纸的工具简单易寻。大学里有此需要：补充教材、复习资料、卷子等，单靠老师是忙不过来的。我当时想，学校通过私人渠道把这种活儿派出来，也许比配备专人刻写或交由专业服务性机构刻写的成本要低。不过，这确实也能帮助一时生计无着如我者，未尝不是积德的事。以我这种新手上路的速度计，每天大约可完成五张蜡纸。我记得当时每张蜡纸的刻印费是一毛六，一天合计8毛，一个月30天不休息的话，也可挣24元。比一个学徒工的工资（比如我妹妹，每月18元）要高。当然，这种活儿总是临时的，不能保证源源不断。

记不清刻蜡纸刻了几个月了，反正不是很久。接下来我去了朋友介绍的一个包工队，不是搞建筑，而是做水电安装。相比之下，这是个需要有点技术的活儿，我当然又只能打下手。好在总有些活儿不那么难，

比如给管道刷刷油漆之类。那时候没有什么民居需要装修，水电安装的活儿多是厂矿基建中剩下的一点零活儿，但对于三五个人的一个小包工队来说也常常尽够干一阵的。我原先只知道有“挖土方”的包工队，心想那主要是靠卖苦力，这是第一回看到干技术活的包工队。事实上我所见到的那个包工队已经流动着干了好几年了，而且看上去还准备长长远远地继续干下去。开了眼界了，才知道那个严密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实也有一些软化松动了的边缘地带，若干“槛外人”（见笑了，此处竟借用了《红楼梦》中语！）就在那里活着。一个人一个活法，那里只怕也是个大千世界呢！

我渐渐也知道了那里的一些门道。一般说，每个街道办事处都设有“服务站”。被“正式单位”挡在门外的人就只剩下一个身份，叫作“居民”，归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管理。照说居住者谁不是居民呢？但“居民”一词更多的时候却是专指散落在各“单位”之外的无业者，那时候购粮本上无业者的定量就被叫作“居民定量”，是定量等级中最低的一档。“服务站”就是让“居民”进行“生产自救”的组织。说是组织，其实也没有什么专设机构，就是能提供一个合法账户，让“生产自救”者外出接活儿干时工钱有个支付的地方。“服务站”收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其他事均请自行料理。“居民”们可是藏龙卧虎，能人多多，各种作坊应有尽有。我有一个朋友在服务站的铁匠铺里做了锻工，另一个朋友则学了修理电动机的技术，自己开了个小修理铺。还有修理自行车的、修锁的、修鞋的、泥瓦匠、缝纫工、木工……至于包工队，大体上总是上门服务，服务的对象多半是国营厂矿，活儿无非是建筑、安装、加工之类。对于国营厂矿来说，零星小活找包工队既方便又划算。对于包工队来说，那些家大业大的厂矿生出来的零星小活却常常是令人喜出望外的

一桩大活儿了。我后来在包工队干了四年时间，活儿就没有断过。但我说的不是前述那个水电安装队。

我在那个水电安装队也没干多久，印象中就拿过一两回工资吧。我总觉得那个包工队有我不多无我不少，之所以接纳我，无论如何都带有帮忙的性质。自己不好意思，便悄悄地另谋出路。恰好有一位交情很好的老朋友在一个城郊公社（相当于乡政府）办了个账户下来，情况类似我前面说的“服务站”提供的账户。也就是说，可以自己接活儿干，自己成立包工队了。他来拉上我和另一位也是交情很好的朋友，一个小型包工队便有了雏形。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介意名目，是包工队还是小作坊都没关系，重要的是要找到活儿干。当时那情景，真有几分类似后来的皮包公司。什么活都想接，而且，也有点什么活都敢接的架势。记得一开张的活儿是给一个直径约一米的铁罐子内面涂生漆，三个人都闹了一身漆疮。接下来就大着胆子接了一个装配热离子交换器的活儿。照着图纸装，倒也难不住我们几个学生哥，难度在于必须使用胀管器让内部十多根管子与两端带孔的圆盘无缝连接，那是要做抗压检验的。好在我们做成了，经检验质量合格。

这以后胆子当然就更大了一些，没多久竟然接了一个为某化工厂加工一批化工设备的活儿。说是化工设备，主要是一些储罐类的东西。一般是用厚度为6毫米或8毫米的钢板卷成筒状，对接焊上，再用同样厚度的钢板窝成锅底状或自行车铃铛盖状做封头，也焊上。一个容器就大致成型，剩下的就是进出口的管道连接之类小活儿了。从行当说，这可以归于大钣金工，又或者可归为铆焊工。我们几个人当时是墨者黑也，完全没有概念，请了几位国营工厂的工人师傅——几位行家里手来带着我们，摆开阵势就进驻了那个化工厂。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就是那几

位师傅把化工厂的这些活引荐给我们的。那年头国营厂矿虽然捧着铁饭碗，收入却是很有限。经济不景气，厂里也没什么活儿干，有技术的师傅就难免技痒，抽着空就到外面找“外快”。我们手里有一个账户，很有利的一个条件，再加上几个无业人员，可以给他们打下手，也可以在他们来不了时打个掩护（工地上总有人在）。总之，两厢情愿，一拍即合，我们的包工队自此开始变得有模有样。

几位师傅是有备而来，一看就知道是找“外快”的老手。随身装备齐全不说，还带着一台自制的手动卷板机，那可是重达几百公斤的物件！他们技术不错，又还不保守，乐意手把手地教我们。我们当然也很愿意学，一个人选一样手艺跟师。我这个人手笨，后来在德国做访问学者时，我那八十七岁的房东老太太就曾教我一句德国谚语来形容我自己的笨：“我有两只左手。”我做工的搭档们都是相交多年的老友，当然更了解我，他们让我选学了最简单的一种手艺——气割。把整块的钢板按图样切割，相当于做衣服中的裁剪。什么事都是熟能生巧，我这么个笨人后来的切割技术也还看得过去。由于切割几乎是第一道工序，所以每到一个新地方，我这两下子总是像打门锤一样最先亮出来，我察言观色看到的反应都还不错。其实这跟现在的出租车司机一样，他们一个月开车的时间与里程，岂是一般人可比？我们那时的工作量，也绝非国营厂矿的工人可比的。因此，我们进驻的好几个工厂，都有领导号召厂里的工人向我们学习哩。这种号召当然是没有意义的，决定我们工作量和工作态度的，其实是一个体制问题。我们虽然是被逼无奈才自己成立包工队的，但那种自主地按甲方乙方的关系订立合同，并按合同工作挣钱的方式，倒多少有点市场经济的味道。所以后来我也曾不止一次地自诩为最早的下海者。